

DOI: 10.16482/j.sdwy37-1026.2018-01-003

# 从意义到意图

## ——多模态话语分析到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新发展

田海龙<sup>1</sup>, 潘艳艳<sup>2</sup>

(1.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天津 300204;

2. 江苏警官学院 基础部, 江苏 南京 211800)

[摘要] 通过讨论多模态话语分析到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发现多模态话语分析虽然将意义的研究拓展到语言之外的多种表意模态,但是并没有充分关注社会活动者利用表意模态实现其意图的社会活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认识,分析这些认识的后现代特征,认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对“符号资源”的认识、对认知和批评分析方法的强调,较现有多模态话语分析路径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

[关键词] 意义;意图;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后现代;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2643(2018)01-0023-11

### From Meaning to Intention:

### New Development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 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IAN Hailong<sup>1</sup>, PAN Yanyan<sup>2</sup>

(1. Centre for Linguistic Semiotic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2. Basic Disciplines Department,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 Nanjing 211800, China)

**Abstract:**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MDA) to 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CDA), it is found that MDA, though extending the study of meaning beyond language to other modes of meaning making, has not paid due attention to the intention social actors aim at by deploying various meaning-making modes. 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MCDA's conceptualization of its research objects and methods and, by analyzing them in terms of postmodernity, proposes that MCDA, compared with other approaches in MDA, is a new step in the developing

收稿日期: 2017-01-16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与国际学术话语的交流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4BYY07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田海龙,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批评话语分析、话语与翻译研究。  
电子邮箱: tianhl@tjfsu.edu.cn。

潘艳艳, 博士, 讲师。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电子邮箱: calmdown2013@126.com。

process of MDA. This proposal is solidly supported by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MCDA's conceptualization of "semiotic resources" and the "cognitive" and "critical" analytical methods.

**Key words:** meaning; intentions; 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ostmodernity; new development

## 1.0 研究的缘起

“意义(meaning)”一般被认为是语言学领域(以及哲学领域)的一个概念。不论是利奇(Leech, 1981)对语言意义研究的“语义学”,还是奥斯汀(Austin, 1962)和塞尔(Searle, 1979)从哲学的角度对言语行为的意义研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对意义的研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即他们关注的是语言(包括语言使用)本身的意义。

将研究的重点限定在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所具有的含义上,使得语义学和语用学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有了长足的发展。利奇(Leech, 1981)围绕语言中的意义与交际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论述语言的社会功能、语义的类型,在词义组成的描述、语义成分的分析、以及句子的语义结构分析等方面奠定了语义学的基础。与此同时,奥斯汀(Austin, 1962)和塞尔(Searle, 1979)从哲学的视角对言语行为的分析,揭示了言语行为中的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中的意义,使得语言运用中的意义问题更明确地摆在了语言学家的面前,进而开启了语用学研究的先河。韩礼德(Halliday, 1985)则是从语域变体(register variables)出发研究语言结构的意义潜势,开创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体系。然而,这些意义研究毕竟局限在语言这一表意形式上面,对语言之外其他表意形式(如图像、影像和音乐等多种模态)所体现的意义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而语言作为一种表意形式(或模态)单独使用的情况也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对交往方式多元化的需求。

虽然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指出,语言只是意义的一种符号系统,但是,索绪尔所暗指的其他表意符号直到二十世纪末才被纳入语言学家的研究视野。受过电影制作训练的范柳文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启发下,与克瑞斯一起提出一套解读图像意义的理论(Kress & van Leeuwen, 1996),开启了对图像中蕴含的意义进行解读的新研究范式,为解读图像(包括图表、影像)等多种模态(mode)中的意义提供了可以信赖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奠定了现在被称为“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基础。

多模态话语分析对意义研究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把研究对象由表意的语言扩展到表意的其他形式(或模态),拓展了意义研究的视野,而且还提出解读图像意义的一套方法(见本文 2.0),丰富了意义研究的方法。但是,克瑞斯和范柳文的多模态话语分析范式并未跳出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藩篱,他们的研究与传统语言学一样,关注的重点仍然集中在“模态”的意义上面,尽管这种模态由语言换成了图像。虽然多模态话语分析令人信服地解决了解读图像的意义问题,但是,对于图像中的意义如何被社会活动者用来实现其交际意图,克瑞斯和范柳文的多模态话语分析范式并没有给予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早期的多模态话语分析范式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抽象的语言系

统一样,仍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那么,发展的空间何在?克瑞斯和范柳文开创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如何实现新的发展?马秦(Machin 2013 2016)和哈特(Hart 2016)等人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为其提供了参考。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活跃的学术背景也为这一新发展提供了土壤。当学者将关注的重点从“这是什么”转移到“如何表达这是什么”(高玉 2009)的时候,学者理所当然的不满足于研究各种模态中的意义,而是自然而然地把研究重点转向社会活动者利用这些模态所实现的意图。所谓“意图”,亦曰“目的”或“动机”,意指社会生活中以机构为依托的人的一种集体意愿,是其采取任何行动的基础,也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选择语言进行交际的基础(van Leeuwen 2000)。在这方面,马秦(Machin 2013 2016)和哈特(Hart 2016)等学者吸收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从多模态话语中蕴含的“意义”扩展到社会活动参与者利用(deploy)多模态话语进行社会实践,观察这些社会活动者通过运用多模态话语实现自身利益和目的的“意图(intention)”,形成了“多模态话语分析”向“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新的发展。

从“意义”到“意图”的转变,不仅是研究侧重的变化,而且反映出多模态话语分析新的研究关注。本文将在讨论多模态话语分析存在局限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多模态话语分析向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发展的趋向,包括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特征和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共同的理论取向。

## 2.0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基本方法及其局限

多模态话语分析作为语言学领域的一个研究流派,始于《阅读图像》(Kress & van Leeuwen, 1996)这本书。该书的立论基础是他们认为韩礼德提出的语言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并非仅限于语言系统,它同样适用于对包括图像、声音、颜色、版式等社会符号的分析。因此,在这本书里,作者参照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 1985)中的三大语言元功能,提出图像的分析框架,认为图像可以体现三种意义: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和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

图像的再现意义与功能语言学中的概念功能相对应,表征图像中人物、地点和事件之间的交际关系或概念关系(Kress & van Leeuwen, 1996: 119)。再现意义依据图像是否有向量这一特点还可进一步分为叙事性再现意义和概念性再现意义。换言之,叙事图像具有向量,而概念图像中则没有向量。据此,克瑞斯和范柳文又参照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关及物性的论述将叙事图像分为行动过程、反应过程、言语过程和心理过程等,其中行动过程和反应过程又可分为及物的和不及物的两种类型。

与图像的再现意义体现图像中各种成分(如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同,图像的互动意义体现图像的观看者与图像中的成分之间的特定关系。根据克瑞斯和范柳文的研究,互动意义主要通过接触(contact)、距离(distance)和视角(perspective)三方面的共同

作用,构建出观看者和再现内容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也可以表示观看者对所再现的景物应持的态度。就“接触”而言,当图像中的表征参与者(represented participants)直视观看者时,表征对象即与观看者接触,尽管这种接触只是想象层面上的接触。这时,图像中的表征参与者似乎在向观看者索取什么,如表征参与者希望与观看者建立一种更加亲密的社会关系等等。这类图像称作“索取”类图像(Kress & van Leeuwen, 1996: 123)。如果没有这种接触,图像中的表征参与者更像是展馆中的展览品,他们只是客观地提供给观看者一些信息,故 Kress 和 van Leeuwen 称这类图像为“提供”类图像。所谓“距离”,是指可以通过表征参与者的框架大小来构建其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图像中只能看得见表征参与者的脸和头,这种近距离可构建出一种亲密的关系。以此类推,如果要构建一种不很亲密的关系,则图像中至少要显示表征参与者的头和肩,或腰部以上;而要构建一种社会关系,就要显示整个人,甚至周围要有空间环绕,直至能看见四到五个人的躯干。观看者和图像中的成分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通过“视角”来构建。实际上,对景物拍摄视角的选择暗示着拍摄者对图像中表征参与者的态度,而且,拍摄者也通过不同的视角影响观看者对表征参与者的态度。例如,正面的水平角度表明观看者属于图像世界的一部分,倾斜的水平角度则暗示观看者不属于图像世界(Kress & van Leeuwen, 1996: 143),而背面取景则暗示了更加复杂、微妙的意义。再如,垂直角度上的仰视、平视和俯视分别体现了表征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不同的权势关系。

正像图像的概念意义与语言的概念功能相对应一样,图像的互动意义与语言的人际功能相对应,而图像的构图意义则与语言的语篇功能相对应。根据克瑞斯和范柳文的研究,图像的构图意义可以从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显著性(salience)和框架(framing)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图像的上下、左右、中心和边缘分别传递出不同的信息值,例如,从左到右的放置结构造成了“已知信息→新信息”的结构;从上到下的放置结构传递的是“理想→现实”的信息结构;从中心到边缘的放置结构传递出“重要→次要”的信息结构。所谓“显著性”,表明图像中的成分可通过被放置在前景或背景、相对尺寸、色调值的对比、鲜明度的不同等方式体现出吸引观看者注意力的不同程度;而所谓“框架”,指的是图像中有无空间分割线条,这些线条表示图像中各成分之间在空间上被分离或被连接的关系。对图像中某个成分的分割越是明显,越是表明这个成分表达的信息与其他成分的不相容或不相关,或者表明这些成分不属于同一个领域或团体。

克瑞斯和范柳文提出的“读图方法”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其对图像“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的解释力不亚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提供的对语言意义潜势的解释力。然而,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意义的解释聚焦在“语法-词汇”层面一样,克瑞斯和范柳文的“读图方法”也将分析和解释的重点放在了图像本身,而对于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运用图像所要实现的“社会-政治”意图却没有关注。正如马秦(Machin 2013: 348-9)所言,克瑞斯和范柳文所呈现的是将语言描述应用到其他交际方式(模态)上的一种可能。这种描述功能强大,可以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将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挖掘出来;但是,同样可能的是,这会导致对技术性的描述过于重视,而对由这种技术

描述可能直接引出研究结论的简单方式视而不见。马秦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这种担心,促进了多模态话语分析在他的研究中更多的融入批评话语分析的原则,进而更多的关注各种“模态”如何被当作符号资源利用、成为社会活动者实现其意图的手段。

### 3.0 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多模态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读图”的方法,当与批评话语分析结合起来应用时,其所具有的对多模态的分析功用便有了进一步的发挥,成为马秦(Machin 2013)所说的“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尽管哈特(Hart 2016)认为多模态话语分析取得的成果对“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田海龙 2013a)有所贡献,但是“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提出更多的是因为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学者认为他们的研究丰富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领域。例如,马秦(Machin 2016)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可以将隐含在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明朗化,可以揭示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活动者按照他们的意愿维持控制的话语策略,而他们的研究(如Abousnoug & Machin 2013; Djonov & Zhao 2014; Machin & Mayr 2012; Mayr & Machin, 2012)也有力地说明,这些揭示性的分析完全可以通过对多模态的分析进行,而且,随着社会实践更多的以多模态的形式进行,批评话语分析也会更多的借鉴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方法。

“多模态话语分析”发展到“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体现出一些区别性特征,可以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认识。

#### 3.1 研究对象由“多模态”到“符号资源”

多模态话语分析将研究的对象从语言中的意义转向图像中的意义,进而扩展到其他的表意符号,如音乐、视频、图标,甚至是报摘的排版格式。这里,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这些多种多样的模态都表达一定的意义。对于如何读出这些模态中的意义,多模态话语分析(以及符号学)发展出令人信服的方法,就如同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出如何读出语言中的意义一样。这些技术性的方法奠定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问题,那就是,多模态在理论上是无穷无尽的,正如马秦(Machin 2013)指出的,战争的话语不仅可以体现在政治演讲和报纸新闻里面,还可以体现在电影、计算机游戏、战争玩具、以及城市广场上矗立的战争纪念碑上面。在这方面,我国学者潘艳艳(2017)也指出,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既有静态的多模态(如漫画、广告、电影海报、网页等),也有动态的多模态(如影视作品、电视访谈、舞台演讲、课堂教学等)。

然而,在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看来,更为重要的问题不是研究对象无限扩展到各种表意模态,也不是将研究对象抽象地表述为各种表意模态都具有的普遍特征,而是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可以依据具体语境加以利用的具体模态。为此,马秦(Machin 2013)提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为“符号资源(semiotic resources)”。尽管“符号资源”的概念已经在多模态话语分析中存在,但是往往指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构成文化现实的意义系统”(见O'Halloran 2013: 121)。马秦在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中重提“符号资

源”的概念,体现出他对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的新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多模态,其意义不具有普遍性、系统性,不是图像中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而是随情景不同而不同的“具体意义”(situated meaning)。“符号资源”所具有的具体意义是可以被利用的,是可以被用来实现“意图”的,这样,相对于多模态话语分析关注多模态的意义,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更关注多模态被利用来实现的具体“意图”。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之所以分析模态所体现的意义,其目的在于揭示社会活动者利用这些模态实现自身的利益和意图。

其次,“符号资源”所体现的另一个与传统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不同的特征是,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强调不同的模态可以提供不同的意义。换言之,在某一特定的情景中,并非所有的模态都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因而也并非所有的模态在某一特定的情景中具有相同的被利用的价值。例如,在街道上,如果有告知行人有危险出现的意图,那么声音这一模态就比图像的模态更容易也能更好发挥作用,因此更具有被利用的价值。在这方面,马秦(Machin 2016)将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定义为“供给驱动(affordance-driven)”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意旨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更多的注重研究具体的模态及其被利用所实现的意图,而非特别关注模态普遍具有的被利用和实现意图的功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符号资源”在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中被认为是间接的通过社会活动者的认知来体现它的作用和价值。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批评话语分析强调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由中介体连接的”(Fairclough & Wodak, 1997),这也是它与批评话语分析前身批评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性特征(田海龙, 2006)。对于连接话语与社会“中介体”的认识,范代克(van Dijk, 2012)提出“语境模式(context model)”的概念,指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是依据自己的知识和经历通过实时的对所处语境的主观判断来认识对方的交际意图。这里所体现的意义和意图的动态性和建构性与马秦(Machin 2016)指出的“图像中的意义并非存在于物体之中”有着很多相似。对此,马秦(Machin 2016)举例解释道,艺术品之所以是艺术品,并不是因为它呈现在画布上,而是因为某种权力使它成为艺术品。

### 3.2 分析方法注重“认知”和“批评”分析

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在提出与多模态话语分析不同的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克瑞斯和范柳文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方法有了新的认识。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倡导者不再满足于分析各种模态中的意义,不再热衷于分析这些意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存在于图像之中,相反,他们的分析焦点更加集中在社会活动者如何借助“符号资源”来实现其社会活动的意图上面。在这方面,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和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方法对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

在认知语言学方面,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注重隐喻和转喻这两个人类认知现象的研究和阐释。例如,潘艳艳(2016, 2017)提出“认知-功能”的分析方法。该方法首先阐述语篇产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介绍语篇的内容梗概和语类特征,接着描述语篇的社会符号特征和意义潜式,并在此基础上识别、解读语篇中的概念隐喻和转喻。最后结合语

境对识别出的隐喻和转喻进行归类,探讨隐、转喻在语篇中的功能,总结隐、转喻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特征。她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两个征兵宣传片,揭示两者在叙事模式和话语策略上的不同,进而深入解读该差异背后深刻的意识形态差异和特征。

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更多的从认知语言学汲取分析养分来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分析方法,也是因为批评语言学家(如 Hart 2016)在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时候注意到,社会活动者在创造意义(或在实现意图)的时候,并不是仅仅依靠语言来构建和再现事实,而是更多的利用多种模态来实现其目的。在这方面,多模态话语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依据。所以,哈特(Hart 2016)认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实际上代表了话语研究和批评话语研究的多模态转向,他甚至认为话语的“可视化”现象要求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重视交际的可视化形式,指出这不仅是交际和研究的需要,还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为研究语言交际提供理据。尽管如此,批评话语分析毕竟有着更长的发展历史和更丰富的理论基础,而多模态话语分析只是在近几年(参见 Machin 2016)才融入批评话语分析。所以,更确切的讲,批评话语分析对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方面的一个实例就是被称为“批评话语分析新工具”(van Leeuwen 2008)的“再情景化(recontextualization)”被作为一个分析方法应用到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之中。

所谓“再情景化(recontextualization)”,通常指一个文本被从一个情景中移出并被植入另一个情景之中(Bernstein 1990; van Leeuwen 2008)。在马秦看来,再情景化所提供的洞察力在于任何一个事件都不是完整无缺的再现,而是通过“符号资源”的被利用来实现某种意图。在利用符号资源的过程中,选择这个符号资源而不选择那个符号资源在本质上就是把某个符号资源“再情景化”的过程。他们(Abousnnouga & Machin 2013)结合对战争纪念碑进行的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指出在战争纪念碑这个符号资源上,纪念碑的矗立者就没有在纪念碑上显示暴力、羞辱、痛苦,却是加入了古典因素和象征不朽和坚固的材料,屠杀也被坚定向前的脚步和挺拔的卫兵所代替。通过隐去、添加和替代某些符号资源,战争纪念碑的矗立者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意图。这方面的另一个实例是田海龙(2016)的对纽约时代广场矗立的一则有中国航天员的广告的分析。通过对这幅图像再情景化的分析,可以看到符号资源被利用来实现某种意图的轨迹。例如,当这幅图像被置于纽约时代广场时,这个新的情景既是一个新的时空,也是一个包含不同接受者在内的多种成分构成体。虽然图像还是原来的展示航天员风采的图像,但是,它在原始语境中表达“中国强盛”的意义或许就成了向世界“表明中国正在崛起的行动”这样一种新意义。尽管图像中航天员所处的“前景”位置以及他们目光与观看者的接触所产生的“构图意义”和“人际意义”(Kress & van Leeuwen, 1996)都较右边一幅有人像的广告以及左边没有人像的广告更醒目,尽管由于图像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而使图像中的航天员俯视路人,但是,就促成这个“再情景化”发生的机构而言,其意图并非一定得到完全的实现。从这个图像中路人的反映来看,他们似乎不是特别关注这样的行动。这似乎表明,尽管中方机构通过再情景化的手段将图像从其原始情景移除、并置于新的情景之中,尽管通过这样的过程中方机构创造出新意义,但是这个新意义在新的情景中由于接受者的原因而使其新意义被认可的程

度大打折扣,也使其意图的实现程度不甚明朗。

#### 4.0 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后现代理念

所谓“后现代”按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利奥塔(1997)的观点,并不是现代在时间上的延续,而是对现代性所声称的某些特点的重写。在语言研究方面,后现代主义往往以后结构主义的形式出现(Baxter 2003:6),形成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例如,摒弃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追求语言研究的多视角;摒弃静态的、封闭的语言系统研究,追求语言研究的动态特征,等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面对“二战”以来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新问题进行反思的结果。随着社会服务业的兴起,推销产品的活动对语言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消费经济、保险以及电话销售等行业也越来越多的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新的经济增长。在数字通讯、电脑、网络通讯等新技术媒体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的同时,网络销售以及信息服务等新兴行业对语言运用的要求也越来越细致入微,而且新闻媒体、广告商以及播音员也对语言的运用进行改造,创造出新的词汇和表达。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语言也成为商品,在推销其它产品的同时也被推销,不仅成为通过语言实现自身目的的社会主体的关注所在,也成为解构其神秘功能、探索其巨大力量的学者关注的焦点所在。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环境中,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学者对话语的研究重视起来。

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许多概念都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田海龙、张迈曾 2007; 田海龙 2013b; 辛斌 2016),但这并不能说明“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在名称上标明了“批评话语分析”就具有了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从以上两个“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区别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特征来看,“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在理念和原则上已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但是,这里仍须辟出一节对此进行讨论,不是表明它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相同,而是凸显“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在所具有的后现代特征方面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新发展。

首先,如果说“多模态话语分析”致力于为解读多模态意义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那么,“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并不关心这种方法是否可以应用到对各种模态的意义解读上面。换言之,如果说“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是一个新的发展,它的发展方向并不是拓展多模态的种类,如仍然依托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将多模态的意义研究从静态图像拓展到动态的视频(见 O'Halloran & Lim, 2014)。相反,这一新的发展摒弃了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宏大理论的目标,注重具体的“符号资源”被利用来实现意图的案例研究。马秦(Machin 2013)关于“多模态的意义不具有普遍性和系统性、不同的模态具有不同的被利用的价值”的论述(见 3.1),都体现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摒弃追求“意义潜势”的态度,这在方法论上与批评话语分析体现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质的研究(田海龙, 2013b)有许多相似之处。在马秦(Machin 2013)看来,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就是要通过对符号资源的分析,揭示社会活动者利用这些资源所实现的意图。这种揭示具有“批评”

(赵芃、田海龙 2008) 的特征,是由社会问题驱动的( socially-driven),也是根据不同符号资源所具有的不同价值所决定的( affordance-driven)。

其次,“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较“多模态话语分析”体现出新的发展还体现在马秦(Machin 2013)认为多模态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是动态变化的。如上所述,马秦(Machin, 2013)在提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是“符号资源”的同时,给予这个“老术语”一些新的注解,认为多模态在不同的情景中具有不同的价值,而且认为多模态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活动者赋予的,是通过间接的认知建构的。这些观点和批评话语分析以及后现代主义关于意义的认识非常一致。例如,田海龙和张迈曾(2007)指出,后现代主义要求重新确立“意义观”,认为意义是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靠内部系统的相互关系来实现和确定的某种实体或意义。田海龙(2015)还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考察社会活动者使用符号资源的动机、目的和意图,指出符号资源的意义并非实现存在于符号之中,而是社会活动者为了实现其动机和目的主动赋予的,对这个意义的解读也取决于社会活动者的利益所在。在这方面,马秦对“符号资源”的解读体现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后现代特征。

## 5.0 结语

“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是西方学者于2013年为从多模态话语分析角度进行的批评话语分析贴的一个标签。我国学者尽管没有使用这个标签,但也有类似的研究成果问世。早期的文章有成文、田海龙(2006)对多模态话语社会实践性的研究。近期,田海龙、张向静(2013)通过对奥运会火种采集仪式上发生的事件的图片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揭示中英媒体采用不同图片体现不同价值取向和传播目的的研究,亦属此类。尤其是这后一篇文章,从分析图像的意义入手,揭示媒体利用作为符号资源的不同图像所传递的不同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媒体利用这些不同图像所要实现的不同意图,体现出多模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质性结合。正像有学者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如 Young & Harrison, 2003)、从认知的角度(如 Hart 2010, 2011)、从语料库的角度(Qian 2010)进行的批评话语分析一样,从多模态话语分析入手进行批评话语分析也是一些研究课题所需要的。然而,如果说“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因与这些不同形式的“批评话语分析”相类似就没有更多的创新,也未免过于草率。本文的研究表明,马秦(Machin 2013)提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这个术语的同时,其对于“多模态”的认识、对“符号资源”理解、以及对从事多模态话语分析应具有“批评”和“认知”意识的强调,都反映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在后现代性观念上的许多共同认识。在一些关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读本(如 O'Halloran, 2013)和综述文章(如潘艳艳、李战子 2017)中,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批评视角都未被明显提及,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所体现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新概念和新发展也未被凸显出来。因此,“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不仅是一个新表达,而且也是一个新概念,它或许具有构建研究新范式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Abousnougá ,G. & D. Machin. *The Language of War Monuments* [M]. London: Bloomsbury ,2013.
- [2] Austin ,J.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3] Baxter ,J. *Positioning Gender in Discourse: A Feminist Methodology* [M]. New York: Palgrave ,2003.
- [4] Bernstein ,B. *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 [5] Djonov ,E. & S. Zhao ( eds. ) . *Critical Multimodal Studies of Popular Discourse* [C].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6] Fairclough ,N. & R.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T. van Dijk ( ed. ) .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C]. London: Sage ,1997. 258 – 284.
- [7] Halliday ,H. M.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Arnold ,1985.
- [8] Hart ,C.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Perspectives on Immigration Discourse* [M].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0.
- [9] Hart ,C. ( ed. ) .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 Context and Cogni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
- [10] Hart ,C. The visual basis of linguistic mean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tegrating cognitive linguistic and multimodal method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6 ,( 27 ) 3: 335 – 350.
- [11] Kress ,G. & 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12] Leech ,G.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 2<sup>nd</sup> ed. )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1.
- [13] Machin ,D. Introduction: What is 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13 ,( 10 ) 4: 347 – 355.
- [14] Machin ,D. The need for a social and affordance-driven 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6 ,( 27 ) 3: 322 – 334.
- [15] Machin ,D. & A. Mayr. *How to D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Sage ,2012.
- [16] Mayr ,A. & D. Machin. *The Language of Crime and Deviance* [M]. London: Bloomsbury ,2012.
- [17] O’Halloran ,K. L.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K. Hyland & B. Paltridge ( eds. ) .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120 – 137.
- [18] O’Halloran ,K. L. & F. V. Lim. Systemic Functional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S. Norris & C. Maier ( eds. ) . *Texts ,Images and Interactions: A Reader in Multimodality*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14. 137 – 153.
- [19] Qian ,Y. F.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around Terrorism in the People’ s Daily ( China ) and The Sun ( UK ) before and after 9. 11* [M]. Oxford: Peter Lang ,2010.
- [20] Searle ,J.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21] van Dijk ,T. Critical context studies [A]. In H. Tian & P. Zhao ( eds. ) .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2. 263 – 295.

- [22] van Leeuwen, T. The construction of purpose in discourse [A]. In S. Sarangi & M. Coulthard (eds.), *Discourse and Social Life* [C].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2000. 66-81.
- [23] van Leeuwen, 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New Tool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4] Young, L. & C. Harriso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M]. London: Continuum, 2003.
- [25] 成文, 田海龙. 多模式话语的社会实践性[J]. 南京社会科学 2006 (8): 135-141.
- [26] 高玉. “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27] 利奥塔.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28] 潘艳艳. 认知-功能角度的动态多模态语篇分析[M].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州有限公司 2016.
- [29] 潘艳艳. 国防话语的多模态认知批评视角——以中美征兵宣传片的对比分析为例[J]. 外语研究, 2017 (6): 8-15.
- [30] 潘艳艳, 李战子. 国内多模态话语分析综论(2003-2017)——以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成果为考察对象[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17 (5): 49-59.
- [31] 田海龙.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 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 2006 (2): 40-47.
- [32] 田海龙. 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 两种路径及其特征[J]. 外语研究 2013a (2): 1-7.
- [33] 田海龙. 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b (4): 6-10.
- [34] 田海龙. 符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社会符号学视角[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 (6): 1-7.
- [35] 田海龙. 跨文化交际的话语解读: 再情景化模式[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2): 50-60.
- [36] 田海龙, 张迈曾. 语言选择研究的后现代特征[J]. 外语学刊 2007 (6): 8-13.
- [37] 田海龙, 张向静. 图像中的意义与媒体的意识形态: 多模态语篇分析视角[J]. 外语学刊 2013, (2): 1-6.
- [38] 辛斌. 语言的建构性和话语的异质性[J]. 现代外语 2016 (2): 1-10.
- [39] 赵芑, 田海龙. 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 评介与讨论[J]. 南京社会科学 2008 (8): 143-147.

(责任编辑: 刘琛)